

秦汉时期的

儒法斗争

广西人民出版社

秦汉时期的儒法斗争



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1975年2月第1版 197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书号：3113·163 定价：0.26元

毛 主 席 语 录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目 录

论“黔首”	石 仑 (1)
秦王朝建立过程中两条任人路线的斗争	
——兼论李斯《谏逐客书》	
.....	武汉大学大批判组 (14)
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	罗思鼎 (25)
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42)
论秦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	云南大学 杨光汉 (55)
西汉前期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	岸 苗 (68)
晁错反复辟的斗争	康 民 (78)
评董仲舒的“独尊儒术”	北京师范大学大批判组 (88)
《盐铁论》简说	辽宁大学中文系 王向峰 (101)
汉元帝刘奭的尊儒反法及其历史教训	李 讯 (111)
评白虎观会议与《白虎通》	洪善思 (120)
论王充的反儒斗争	钟 达 (130)

论“黔首”

石 仑

一九七三年夏，山东省文登县简山公社在当地发掘出一只秦代的铁权。这只铁权重三十二公斤，略呈扁圆形，顶上铸半圆形的鼻，权旁镶一块铜诏版，铜版上刻着秦始皇二十六年的诏文，内容是：“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欺疑者皆明壹之。”①

这篇短短四十字的诏文，不仅说明了秦王朝在当时统一度量衡的努力，而且从中可以获得当时社会大变动的证明。

“黔首大安”这句话，对我们正确评价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和研究当时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公元前二二一年（即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王朝统一六国后，颁布了一项重要法令：“更名民曰黔首”②，就是将“民”改名为“黔首”。这项法令公布后，天下“大酺”③，即“天下欢乐大饮酒也”④。成千上万“黔首”饮酒欢呼，庆祝这一改变名称的措施。

①引自一九七四年第七期《文物》杂志。这类镶铜诏版的铁权，一九五七年在山西省左云县也曾发现过一件，所刻诏文与本文一样。此诏文也见于《全秦文》。

②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

为什么秦王朝这样重视对“黔首”的政策？为什么“更名民曰黔首”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要正确理解这一命名的历史意义，就必须揭示先秦时代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过程中社会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

毛主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民”是伴随着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即人类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后出现的阶级概念，是对奴隶的称呼，又写作“氓”或“𡵓”。在商代甲骨文中，“民”字的形象就是被刺瞎了一只眼睛的戴着镣铐的奴隶。在商、周时代，“民”可以被任意赏赐或买卖，也可以被任意屠杀，被当作奴隶主的殉葬品。他们是奴隶主的财产，没有任何权利。在《论语》中，绝大多数的“民”是作为同“人”相对立的被奴役、被统治的阶级，即奴隶阶级而出现的。孔丘对“人”即奴隶主贵族讲“爱”，对“民”则从不讲“爱”，只讲“使”。如《泰伯》篇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宪问》篇中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在孔丘眼中，“民”是被“人”使用的工具，永远只配处于被驱使的地位。这说明了，在奴隶社会里**“基本的事实是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奴隶不仅不算是公民，而且不算是人”**（列宁：《论国家》）。

但是，随着社会大变革的发展，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包括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到“民”这个概念所包含的阶级内容上来。从春秋时期以来，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产生了新的阶级，这就是地主和农民。当时，波澜壮阔的奴隶起义，推动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些原来可杀可卖的

“民”，逐步地争得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而成为农民，极少数的还逐步进入到地主阶级的行列。而奴隶主中的一部分则日益破产，丧失了原来的尊贵身份而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在地主阶级掌权的地方，则变为失去了权力的被统治、被专政的对象，时刻梦想复辟，成为所谓的“逸民”。

在这个社会阶级关系大变动的面前，儒法两家实行的是两条完全对立的政治路线，因而对“民”所反映的实际的阶级内容，也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要求“正名”，反对奴隶的解放，妄图恢复“民”原有的阶级内容，取消地主阶级和农民已经争得的社会地位，重新确立“民莫敢不敬”、“民莫敢不服”①的奴隶主专政，回到“使民战栗”②的西周奴隶社会中去；同时力图使那些下降为“逸民”的奴隶主恢复已经丧失了的地位，这就叫“举逸民”。“举”包含有上升、选拔的意思，要使“逸民”重新上升为统治阶级，正是为了使地主阶级下降为被统治阶级，使农民重新变为奴隶。战国时期，孟轲发展了孔丘“正名”的反动学说，鼓吹什么“民为贵”③，这里的“民”显然不是指广大的农民或奴隶，而是指已经没落的降低了社会地位的奴隶主。他实质上是企图依靠降为“逸民”的奴隶主，作为复辟奴隶制的社会基础。他咒骂新兴地主阶级是“贼民”④，咒骂劳动人民是同“禽兽”一样的“庶民”⑤。

①《论语·子路》

②《论语·八佾》

③《孟子·尽心下》

④《孟子·离娄上》

⑤《孟子·离娄下》

《孟子·尽心下》①

《孟子·尽心下》②

《孟子·尽心下》③

《孟子·尽心下》④

法家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路线，强调打击造成国家“田荒而兵弱”的“五民”，如“诗书、谈说之士”和“商贾之士”等^①，这些人韩非称之为“五蠹之民”^②，主要是指儒家之徒以及工商奴隶主等。法家从建立和巩固封建政权的目的出发，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坚决主张提高“农战之民”^③即地主和农民的社会地位。法家的路线适应了战国时期“农战之民”兴起的局面，合乎历史的潮流。在这种形势下，“农战之民”逐渐取得了“黔首”的称呼。

“黔首”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的产物，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出现的名称，就象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都称为“第三等级”一样。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地主阶级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而广大农民是劳动者。据先秦时代的记载，“黔首”一词最早大约出现在战国中期^④。战国末年，《吕氏春秋》、《韩非子》、《礼记》以及李斯的文章，都讲到了“黔首”。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农民已比较壮大，“民”这个名称的阶级成份比过去更加复杂了。客观的社会需要，推动着人们在习惯上逐步称地主和农民为“黔首”，以区别于社会地位下降为“逸民”的奴隶主。后来，这一名称传进了秦国，随着秦国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和巩固，“黔首”的称呼也日益流行开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用“黔首”作为人民的定名，并颁行天下。因此，清代学者王念孙说：“黔首”

①《商君书·算地》

②《韩非子·五蠹》

③《商君书·农战》

④《战国策·魏二》

“旧有此称，而至秦遂以为定名，非始皇创为之也”^①。

“黔首”一词，最初是根据农民的特征而来的。据《广雅》解说：“黔首，氓民也。”^②《说文》认为：“秦谓民为黔首，谓黑色也。周谓之黎民。”^③在西周时代，“氓民”就是“黎民”，也叫“人鬲”，指的都是奴隶。为什么称奴隶为“黎民”和“人鬲”？黎有黑的意思。鬲就是一种用于煮饭烧水的器具，经常受烟熏火燎，当然也是一片黑色。奴隶成年累月在野外劳动，脸色是黑黑的。奴隶主称他们是“黎民”或“人鬲”，含有侮辱和轻视的意思。“黔首”同奴隶不同，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但占“黔首”中最大多数的农民同奴隶确实具有渊源关系。黔同黎一样，也有黑色的意思。应劭说：“黔亦黎，黑也。”^④朱熹也承认“黔首”和“黎民”得名于黑色，但又把他们说成是满头黑发的“少壮之人”^⑤，这就完全抹杀了“黔首”和“黎民”的阶级内容。据《吕氏春秋》，“黔首”的特征是“颜色黎黑”^⑥。农民同奴隶一样，都是被剥削的劳动者，沉重的野外劳动使他们的面色晒得黑黝黝的，并且不准戴冠冕，只能用“卑贱者所服”^⑦的黑色头巾缠头，因而获得了“黔首”这一名称。

在封建制战胜奴隶制的过程中，“黔首”的社会地位逐步得到了提高。这是他们同奴隶主阶级长期战斗的成果。“黔首”中的不同社会成份，在消灭奴隶制的过程中起着很不相

①②《广雅疏正·释诂》

③《说文解字》卷十上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

⑤《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上》

⑥《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

⑦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〇《巾幘考》

同的历史作用。地主阶级代表了新的生产关系，是反对奴隶制的革命的领导者，而广大农民则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农民的前身就是奴隶。千百万奴隶的起义和反抗，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社会的基础。春秋末年的柳下跖起义，就显示了巨大的革命威力。章太炎说，柳下跖“其道甚大，而违于周法”，对于奴隶制统治来说，“非跖莫能破其神道诞妄”，“非跖无以弹其淫名”，“非跖则不均平通达”^①。广大奴隶挣脱了奴隶制的束缚而上升为农民后，构成了“农战之民”即“黔首”的主要部分。他们要求彻底摧毁奴隶制度，决定了奴隶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地主阶级正是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能够战胜奴隶主阶级而上升为统治阶级。秦国的商鞅在变法中就提出了奖励“耕战”的政策，明确地认为：“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②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广大奴隶要求摆脱奴隶制的强烈愿望，主张“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③，即给他们一小块土地，免除三世的赋役，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商鞅变法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各以差次名田宅”^④，即坚持封建土地所有制，部分地满足奴隶的土地要求，从而使他们变成农民，并且“劝民耕农利土”^⑤，急剧地提高了秦国封建政权的经济力量。正是在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农战之民”的基础上，秦国才能“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⑥。

“黔首”中包含着不同的革命阶级。奴隶制度越是走向灭亡，“黔首”中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社会地位就越高。战国末年，“黔首”中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秦国取得了很高的

①章太炎：《检论·儒侠》

②③《商君书·徕民》

④《史记·商君列传》

⑤⑥《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政治地位。那个“富贵极矣”的秦国丞相李斯，就自称是“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①。至于“黔首”中的广大劳动人民，其社会地位显然要低得多。李斯说道：“苦形劳神”，“则是黔首之役”^②。这个“黔首”，指的就是劳动人民，他们仍然是受剥削的对象，但他们的地位和状况，特别是自耕农，毕竟要比奴隶高些。李斯自称“黔首”，就说明了这一称呼在当时已不再是一个侮辱的称呼，而是个颇值得自豪的称号。这种状况，反映了“黔首”中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社会向前推进，都已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这种背景下，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儒法两家，都竭力争夺“黔首”中的广大农民群众。儒家为了反对社会变革，维护和复辟奴隶主反动统治，就装出一副同情农民疾苦的姿态，向新兴的地主阶级实行反攻倒算。吕不韦就猫哭老鼠假慈悲地说：“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③。在吕不韦看来，造成“黔首之苦”的根源是由于象征奴隶制度的周天子垮了台，所谓“贤者”即奴隶主贵族失了势，而地主阶级的“世主”却神气起来了。其实，造成“黔首”中广大农民当时遭受灾难的根本原因，正是以吕不韦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他们用儒家路线代替法家路线，只能使“黔首”中的广大农民重新沦为奴隶。同吕不韦之流相反，法家认为必须实行地主阶级专政的路线。韩非明确地说：“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④“民萌”即“民氓”，

①②《史记·李斯列传》

③《吕氏春秋·孟秋纪·振乱》

④《韩非子·问田》

同“众庶”一起，当时都属于“黔首”。李斯也说：“王者不却众庶”，不能“弃黔首以资敌国”^①。这些话表明，法家为了用封建制战胜奴隶制，非常注意争取“黔首”中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使他们脱离了奴隶状态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因而他们在当时是支持这条法家的政治路线的。

然而，直到战国末年，“黔首”的社会地位还是不稳定的。奴隶主阶级的残余势力是当时分裂和混战的根源，给“黔首”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因此，广大“黔首”迫切要求进一步彻底摧毁奴隶制度，结束分裂和混战的局面，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秦始皇提出了“烹灭强暴，振救黔首”^②的口号，发动了统一战争。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得到了“黔首”们的普遍支持。人民是统一战争的主力，他们为国家的统一造成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力量，他们为国家的统一浴血奋战，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这是秦始皇能够迅速统一六国的根本原因。汉代的法家晁错说：在秦王朝的统一战争中，六国失败的根源是由于“民不用”，即人民反对分裂割据的局面；而秦国所以“能兼六国，立为天子”，是由于“财用足，民利战”^③。人民的支持，决定了统一战争的必然胜利。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黔首安宁，不用兵革”^④的条件。汉代的严安说：秦王朝统一六国后，“元元黎民得免

①《史记·李斯列传》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汉书·晁错传》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于战国”，“人人自以为更生”①。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封建制，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其中的基本措施之一，就是“更名民曰黔首”，肯定了“黔首”在长期斗争中取得的社会地位。几百年来，“黔首”的社会地位由低到高，作为“黔首”特征的黑色也由贬义转变为褒义。秦始皇接受和改造了战国末年流行起来的“五德相胜”说，认为周代奴隶社会是火德，秦王朝以水德克服了火德。水德呈黑色，秦王朝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②，黑色成了象征秦王朝政权的颜色标志，在当时是最高尚的颜色。因此，称“民”为“黔首”，无疑是对当时人民的尊称。秦始皇用“以水胜火”的观点来证明秦王朝建立的合理性，这固然是一种历史唯心论。但它的实际内容，却反映了封建制战胜奴隶制、“黔首”战胜奴隶主阶级的客观现实。“更名民曰黔首”，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总结。它从法律上肯定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肯定了劳动人民不再是奴隶。后来，秦始皇进一步取消了没有功勋的宗室贵族的特权，“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③。这就是章太炎所说的“帝族无功”者，“与布衣黔首等”④。公元前二〇七年，秦二世在被杀前曾说：“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⑤可见，秦始皇时，确实执行了使宗室子女为“黔首”的政策。

“更名民曰黔首”，是进一步摧毁奴隶制度、巩固封建制度的一项比较彻底的政策。这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阶级关

①《汉书·严安传》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史记·李斯列传》

④章太炎：《秦政记》

⑤《史记·秦始皇本纪》

系深刻变化的结果。它标志着奴隶占有制的社会阶级关系基本上被摧毁了，而封建的社会阶级关系终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来了。列宁指出：“由于剥削形式的改变，奴隶占有制国家变成了农奴制国家。这件事有很大的意义。”（《论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更名民曰黔首”的进步历史作用。

在确立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秦始皇又宣布“忧恤黔首”，保护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公元前二一九年，秦始皇实行了“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①的政策，打击工商奴隶主，稳定和改善“黔首”的经济地位。公元前二一六年，秦始皇根据商鞅“各以差次名田宅”的政策，“使黔首自实田”^②，即下令“黔首”各人自报所占田亩数，承认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并相应地进行赋税的征收。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它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废除了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确定了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秦代农民负担的徭役并不是很重。当时，“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③，而徭役则从“闾右”开始，首先征发因不执行法家路线而犯了罪的吏、工商奴隶主，接着是征发豪富，当然也征发贫苦农民即“闾左”服役，但规定每年只服劳役一个月，一生作正卒一年和戍边一年。这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秦王朝建立以后，仍然面临着奴隶主复辟的严重威胁。尤其是那些反动的儒生，他们“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

③《史记·陈涉世家》索隐

惑乱黔首”^①，竭力用“颂古非今”的手段，欺骗“黔首”，以便于复辟奴隶制度。在这些反动儒生“或为诤言以乱黔首”^②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仅仅依靠本阶级的力量是无法防止奴隶主复辟的。因此，秦王朝在保护“黔首”的政策中，包含了承认农民从奴隶制下摆脱出来后所获得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内容，以争取劳动人民对新建立的地主阶级政权的支持。正是由于秦始皇采取了提高“黔首”地位的法家路线和政策，才粉碎了反动儒生“惑乱黔首”的阴谋，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维护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王朝。

由于地主阶级的局限性，秦始皇虽然坚决镇压了一批反动派，复辟的逆流暂时被压了下去，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直接依靠广大劳动人民反对奴隶主复辟的措施，反复辟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全国各地埋藏着一大批旧贵族分子，他们的政治代表赵高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到了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一死，赵高立刻发动反革命政变，用儒家路线代替了法家路线，“黔首”的地位急剧地发生了变化。地主阶级和法家遭到沉重的打击，劳动人民受到了血腥的阶级报复。社会上笼罩着一片“黔首振恐”的气氛，同秦始皇在世时“黔首安宁”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世信赵高之计”的结果，“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③。在赵高血腥的暴力镇压下，咸阳城里，“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④。伴随着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以赵高为头子的奴隶主复辟政权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进

①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盐铁论·诏圣》

④《盐铁论·周秦》

行了敲骨吸髓的剥削。徭役的规模空前扩大，大批原来服役较轻的“闾左”遭到了无休止的征发。铁的事实证明，反革命复辟一旦得逞，人民就要遭殃，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受的灾难尤其深重。林彪阴谋复辟资本主义，不也就是要把亿万劳动人民打入血泊之中吗！

但是，赵高的反革命政变并没有能使“黔首”屈服。陈胜、吴广领导的革命农民首先发难，举起了武装起义的大旗，迅速推翻了赵高的反动统治，显示了革命农民在摧毁奴隶主复辟的斗争中的伟大历史作用。这一胜利果实，后来为地主阶级所利用，这就是刘邦所建立的西汉王朝。刘邦正是在“黔首”支持下，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打败了项羽为代表的奴隶主势力。“汉承秦制”。西汉初年，“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①，继续执行了秦始皇尊重“黔首”的政策。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因此，秦末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结果，为地主阶级取得反复辟的胜利扫清了道路；而对农民自己，则是用新的封建制枷锁代替了旧的奴隶制枷锁。

“黔首”的产生及其社会地位逐步提高的历史，就是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劳动人民从奴隶转变为农民的历史。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统治的基础，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德意志意识形态》）。封建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劳动人民从奴隶的地位中解放了出来，这就决定了地主阶级在其革命时期，在其反对奴隶制这一点上，能够得到劳动人民的支持。

^①《史记·张丞相列传》

但是，农民在封建社会中仍然要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归根到底，地主阶级领导的革命，同一切剥削阶级领导的革命一样，是用新的剥削制度代替了旧的剥削制度。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最先进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劳动人民得到彻底的解放。当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阶级斗争其中包括儒法斗争的历史，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逐步地实现在地球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彻底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十期）